

稳定币爆红，新一轮货币竞争初现

■ 刘涛

过去几年，加密货币行业潮起潮落，当比特币的价格冲破 13 万美元，再一次到达历史高位时，随着监管框架的完善，稳定币也风头正盛。

5 月 21 日，中国香港《稳定币条例草案》获通过，成为全球首个对法币（法定货币）稳定币实施全链条监管的司法管辖区，《条例》将于 8 月 1 日正式生效，要求任何人在香港发行法币稳定币，或在香港或以外发行宣称锚定港元价值的法币稳定币，必须向金融管理专员申领牌照；5 月 28 日，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发布“关于稳定币发行、加密资产托管”的咨询文件；6 月 17 日，美国《指导与建立美国稳定币国家创新法案》（简称《GE-NIUS 法案》）获参议院投票通过，该法案要求稳定币发行方必须以美元或等值高流动性资产（如银行存款、短期美债等）进行 100% 全额储备；此外，新加坡、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都启动了稳定币立法的工作。

在这股热潮的带动下，6

月 5 日，全球第二大美元稳定币 USDC 发行公司 Circle 在纽交所上市，短短两日股价暴涨至 138.57 美元（发行价 31 美元），6 月 23 日触及 298.99 美元的上市以来高点，截至 6 月 30 日收盘报 181.29 美元。而在亚洲市场，6 月 25 日获得香港加密货币交易牌照的国泰君安国际当天也以大涨 198.4% 收盘，足可以看出稳定币概念在资本市场的热度。

不过，韩国央行警告称，稳定币的采用可能会阻碍有效的货币政策。国际清算银行（BIS）近日亦发报告警告，稳定币前途“不明”。

在数字货币市场中，早期是可以用法定货币来买卖虚拟货币的，但后来由于各国的监管政策，导致部分国家的投资者无法使用法币直接交易。在这种情况下，为解决虚拟货币买卖的出入金问题，稳定币应运而生。

2014 年 7 月，首个稳定币 USDT 由泰达（Tether）公司推出，以 1：1 的比例锚定美元，主要服务于那些无法直接使用美元进行数字货币交易的人群，泰达公司每发行 1 个 USDT，其银行账户有 1 美元资金保障。公开数据显示，2024 年，稳定币支撑的交易额

高达 27.6 万亿美元，超出全球支付巨头 Visa 和万事达卡的交易额总和。这意味着稳定币有望成为全球交易中主流的支付与结算选项。

稳定币，顾名思义就是要“稳定”，它有两个根本性特征：首先，它是一种加密货币；其次，它的价值与某种法定货币、黄金或其他具有稳定性的实物资产挂钩。这两个特征带给稳定币两大优势：作为加密货币，交易稳定币不需要银行账户、不受银行监管，跨境转账快；而由于与资产挂钩，稳定币比其他加密货币更稳定，不会剧烈波动。

目前市面上主流的稳定币类型主要有三种，主要区别为锚定方式的不同：法币锚定、加密资产锚定和算法锚定。法币锚定是最直接的方式，也是目前市面上最主流的稳定币。

当前，稳定币市场中，美元稳定币占据绝对主导，有预测称，到 2030 年稳定币的供应量可能激增增至 3.7 万亿美元，未来以欧元、澳元、英镑、日元、港币等法币为基础的稳定币应该会不断涌现，作为新一代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各国货币竞争会进一步以法币稳定币为载体展开。

中国央行行长潘功胜在 6



月陆家嘴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称，央行数字货币、稳定币蓬勃发展，从底层重塑传统支付体系，大幅缩短跨境支付链条。在同一论坛上，央行前行长周小川亦表示，美元稳定币可以促进美元化，或将产生全球性影响。二人的讲话虽未表现出监管有意在岸市场放松对加密货币一直以来的禁令，但主动提及这一国际支付体系的最新发展，并对其作用加以肯定，耐人寻味。尽管官方尚未对内地的加密货币监管松口，但中国企业已面向海外摩拳擦掌，京东和蚂蚁集团均开始准备在香港发行稳定币。

在香港，机构申请稳定币牌照需满足严格条件。一是主体资格，发行人须为香港注册公司，或者是获得香港金管局认可的海外银行机构，同时至少

3 名关键管理人员（如 CEO、CFO）需常驻香港，确保日常运营受本地监管。《稳定币条例》还列出了必须满足的标准：非银行机构需满足 2500 万港元最低实缴资本；储备资产至少等于未赎回稳定币面值，且为现金、国债、代币化银行存款等“优质、高流动性资产”，严格禁止部分储备模式等诸多条件。

今年 2 月份人民币在中国双边货物贸易结算额中的占比，已经达到 30% 以上，为十年来最高。如果离岸人民币稳定币得以成功推出，有望成为提升人民币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机遇。不过，也有经济学家提醒，发展离岸人民币稳定币并非推升人民币快速国际化的灵丹妙药，作为一种支付工具，其受欢迎程度最终仍取决于人民币自身的吸引力。

全球博士生过剩，业界呼吁培养“产业博士”

近日，《自然》新闻版块撰文指出，过去几十年来，全球博士毕业生数量稳步增长。在中国和印度等国家，这一数字更是呈爆发式增长。

为解决博士生过剩的难题，业内呼吁推出诸如“产业博士”的替代选择，能让博士生与企业合作，完成面向实际产业需求的研究，并更好地满足多样化的社会和劳动力市场的人才供给。

传统上，博士学位是终身学术生涯的“垫脚石”。同济大学博士生导师朱鸿明教授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近几年来，国内考博的人数越来越多了，一方面是传统的本—硕—博—教职的职业路径依赖，另一方面也因为硕士的就业竞争激烈，很多研究生认为博士学位在就业中具有优势。”

《自然》援引数据显示，在

中国，2013 年至 2023 年期间，博士生人数翻了一番，从约 30 万人增加到 60 多万人。“这个数字非常庞大，而且还在持续增长。”香港大学专注于高等教育政策与实践研究的教授雨果·奥尔塔（Hugo Horta）表示。他分析认为，推动这一增长的因素有很多，例如拥有学士和硕士学位的人数不断增加，以及许多人期望投资高等教育能带来更好的经济回报。

但奥尔塔表示，学术界的就业岗位数量并没有跟上博士学位持有者数量的增长。一位美国高校教授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全球的“博士潮”与过去十几年各国科研经费和项目的数量增长也有很大关系。“当科研经费充足时，很多研究课题负责人就有机会招募大量的博士生。”他指出，但现在在美国很多高校和科研机构

的财政预算都在缩减，留给这些博士毕业生的岗位也不会那么多了。这意味着过去希望通过读博来追求学术生涯成就的人未来可能需要从非学术工作领域寻求工作机会。在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国家，非学术工作正日益成为博士生的常态。

据 2023 年的一项研究调查，在英国 4500 多名博士毕业生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博士毕业生在学术界以外的工作岗位就业。而一些在学术界以外找到工作的毕业生从事着与自己专业相关度并不高的工作，他们认为自己学历过高，但由于专业对口度不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拥有博士学位的人薪资也并不一定就比拥有硕士学历的人高。在这一背景下，教育界呼吁重新审视博士培养的导向与方案，

更好地帮助毕业生适应快速变化的就业市场。

“我建议增加高校与企业联合培养博士生的招生规模，以产业界需求为导向，在高校培养科学思维、到企业解决实际技术难题。”朱鸿明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相应的评价机制也应调整，以医学工程博士为例，帮助企业解决具体的技术问题是衡量其水平的关键，而非论文几篇或者影响因子多少。”

上述人士所称的这类校企联合培养博士也被称为“产业博士”。日本、德国和英国等国家已经开始改革了，比如让博士生在研究期间接受培训和带薪实习，或是推出诸如“产业博士”的替代选择，“产业博士”让学生与企业合作完成他们的研究。

在国内，多个领域也已经开始了这种校企联合的人才

培养模式。例如，上海理工大学东方泛血管器械创新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就面向创新医疗器械的市场需求，解决医工交叉的技术难题。在计算机领域，某数据库等计算机基础软件本土企业与复旦大学等高校院所联合培养数据库领域科技创新人才，学生毕业了能得到优先去对口企业工作的机会，其中也包括博士生。

“我们必须改变博士教育，培养面向市场需求的人才。”一位参与校企联合人才培养的企业负责人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分析和批判的思维能力都是就业市场所看重的。我们呼吁企业与高校院所等构建多主体协同配合的创新联合体，加速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

（来源：第一财经）